

创始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
最受读者欢迎的人文思想读本



在北大听讲座

第20辑 文池/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在北大听讲座

王康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在北大听讲座

张岱年题

文池/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北大听讲座(第20辑) / 文池主编.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104-0927-1

I. ①在… II. ①文…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4899 号

在北大听讲座 (第二十辑)

策划: 子 寒

主编: 文 池

责任编辑: 慧 钰

封面设计: 大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 (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20×970 1/16 印张: 16.75

字数: 33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0927-1

定价: 29.00 元

目 录

国事关怀

- 1 21世纪中国对外政治和经济交往的挑战 金立群
17 百国归来的思考：中国模式及其国际意义 张维为
39 中国行政区划与地方行政管理 韩茂莉
57 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儒家文化的命运 卢晖临

公民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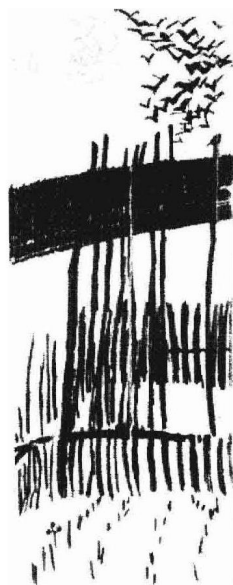
- 69 拨云见日——驱散“山寨”知识产权迷雾 张平
89 民主与民主主义 赵瑛
——以康有为、陈独秀有关“宪政与孔教”的辩论为证？
111 反垄断第一案质问电子监管码、毒奶粉事件再写公开信
——专家点评行政监管 周泽 沈岗 邓峰
129 台湾民主的沉沦与再兴 朱云汉

文化镜像

- 149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特点 王恩涌
163 从反传统到国学热 胡军 吴增定
185 周易与殷周时代的宗教思想 刘正
207 儒行与《儒行篇》 杨立华
225 伦理学是什么 王海明
245 萧逸的侠义人生 萧逸
255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以《新青年》为视点 王奇生

21 世纪中国对外政治和 经济交往的挑战

金立群



阅读提示：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了解有多少？理解又有多少？由于西方媒体对民众的影响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相信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模糊的国界与本土化趋势共存，新的地缘政治带来新的挑战，新一轮的美国金融危机也影响着世界的局势。中国应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金立群

浙江镇海人。198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毕业，进入财政部工作；1998年开始担任财政部副部长；2003年竞选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并胜出，成为第一位中国籍亚行副行长；2006年担任亚行常务副行长，并获得连任。《中国金融家杂志》2007年封面人物；《华人金融家》入选人物；美国汉弗莱学者（Hubert Humphrey Fellow）。目前任中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党委副书记。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进行交流，谈谈我个人多年来在国内外工作的一些经验教训和体会。也非常感谢各位同学花费宝贵的时间来听我的讲座。我想尽量多留点时间与同学们交流，欢迎同学们提问题。我知道北大的同学是非常喜欢提挑战性问题的，我不一定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但是我会愿意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

刚才院长（主持人）提到我的经历。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和你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差别。今年是改革开放 30 周年，我是 1978 年到北京来读书的。如果大家对我当时的体会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中国日报》（China Daily），把我的名字输入进去，就可以看到我写的一篇关于纪念高考恢复 30 周年的专栏文章（What College Examination Meant to Us）。我认为，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挑战。我们当时的挑战是，在看不到任何机会，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情况下，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而现在你们的挑战，则是有太多的机会，怎么样去把握的问题。我 1968 年下乡插队，1978 年考到北外当研究生，其间在农村劳动了十年。所以，我在文章里讲到，我们这一代人首先经受的是肌肉疲劳考验，其次是心理疲劳考验，就是你能不能在没有任何许诺让你重返学校的前提下，坚持学习。我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学习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遇到的挑战，从根本上说是每个人遇到的挑战。如果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不能战胜自己，战胜客观环境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战胜整个民族面临的挑战。所以，我想，从年轻时就要努力学习，思考各种各样的重要问题。

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每年都会招一些大学生进来，我特别要感谢北大，给我们输送了大量人才，这些优秀人才在财政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欢迎你们将来进入国家机关、民族企业等各条战线，为我们民族的发展和繁盛作贡献。在学校里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常对新进来的同事说，你进入我们部，最初的五年对你的人生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离开学校以后，特别是没有考试后，会突然觉得非常轻松。这种心态是要不得的，因为当你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以后，其实天天都在考试。我在关于恢复高考的文章里写到，当我们踏进 1978 年的考场



时，你考试的成绩实际上早就决定了。因为如果从“文革”开始后你一直没有停止学习，那么进入这个考场对你来说太容易了。但是，如果当听到政府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的时候再去抢着书来念，最终考试的成绩会怎么样，大家已经心中有数了。在座的同学有的很快就要毕业，踏上工作岗位。我希望你们把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作为接受挑战、接受考试的一个起点。

我下面讲第一个问题：中国与国际社会彼此的了解。我在财政部工作了 28 年，其中在世界银行工作了 6 年，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读研究生，然后在亚行工作了 5 年，接触到不少的人。我经常会思考的就是中国和国际社会彼此了解的问题。这次奥运会以后，我们国人感到非常振奋，扬眉吐气，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民族自豪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有人感到通过这个活动，让国际社会了解我们，彼此之间增进了了解，这也是对的。但是我想说明，加深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了解是一个永久的话题，不是仅靠几个大型的活动就能解决的。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我们打开了门，国人遍布世界各地，国家领导之间的往来非常频繁，民间交往也与日俱增，旅游者增加，学生的交流也更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毫无疑问，这些交往增进了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了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运动员、游客的到来，增进了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他们到中国来了之后，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的印象会有很大的改变。你不见得会改变他们某些根本的思想观念，但至少会让他们感到，自己以前对中国的认识不那么正确客观。但我认为，这些还远远不够。中国有 13 亿人口，真正能接触到外部世界的人有多少？更不要说走出去。除了中国，世界还有 50 亿人，这 50 亿人到中国来的有多少呢？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能来的人可能经常来，不来的人永远也来不了。所以中国和国际社会双方之间的接触点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这里要弄清两个概念：“了解”和“理解”，这完全是两回事，千万不要把它们等同起来。了解是彼此之间通过某种方式来知道对方。这样是可以消除一些隔阂，增进互信。但是，往往非常深刻的了解反而会加剧冲突和矛盾。中国以前有句话说：他们是以误会而相爱，以了解而分手。为什么，因为彼此不太了解对方，所以有可能相爱；当真正了解了对方之后，觉得并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不要把“了解”和“理解”划上等号。外国人进来了，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但还不一定是理解，两者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冷战的时候，美苏代表两个阵营，他们之间不了解吗？不是，他们非常了解对方。在美国社会里面，有很多人专门研究苏联问题，专门研



究共产主义。这种了解并不等于他会接受你，他会理解你。反倒是当他更了解你以后，他可以更容易地发现你的弱点，更能打击你，这就是中国人讲的知己知彼。所以，这两个概念要分清楚。越是深入了解对方的，立场越强硬，策略越高明。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些宗教信徒，中间不乏有学问、有头脑、有文化的人，对别的宗教信仰也比较熟悉，但有的时候彼此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却是成问题的。所以由了解到理解这一步有时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我认为，我们不仅要让国际社会来了解我们，更要让他们理解我们，我们也应该了解和理解他们。只有真正理解了，才会更加宽容地相处。了解是先决条件，但不一定能自然地过渡到理解。但第一步，西方世界对中国还是缺乏了解和信任。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刚举办完奥运会，外面对我们经济建设取得的进步、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志愿者一流的服务可以说是好评如潮，而且我相信绝大部分这样的好评是真诚的。但是，就在最近，欧洲国家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当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他们经常做这类民意测验，叫做 Harrison Opinion Polls（哈里森民意测验）。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的稳定是最大的威胁？有一段时间，俄罗斯被西方民众认为是威胁，但还可以接受，大概美国人把俄罗斯当作威胁的比例比较高。前几次，美国被欧洲人认为是最大的威胁，还有伊朗、伊拉克、朝鲜、中国等。而就在俄罗斯跟格鲁吉亚发生冲突以后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21%的人认为中国是对世界不稳定最大的威胁。俄罗斯虽然从5%上升到17%，却仍排在中国后面。这个情况一定让大家大吃一惊。我们怎么可以接受这个现实？但这就是人家的民意，我想正是因为在这中间有很大的不了解的成份。

从经济层面上看，中国的出口商品大量地销到美国、欧洲，侵犯了一些低劳动阶层的利益，使这些人对中国产生了不友好的情绪。但不了解更多是因为信息源有问题，媒体的误导造成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其中当然有电视、报纸、网络等等。我们要非常重视媒体的作用，但又要承认一个现实：你想让媒体对你友好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奥运会之前，因为达赖喇嘛分裂集团制造了一些麻烦，我跟西方国家的一些记者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朋友，私下可以讲得很坦率。他们跟我说，达赖喇嘛在西方很有市场，你们真要想想办法怎么来对付这件事。其实并不是他宣传的本事有多大，而是媒体信息源的问题。我把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下的政体民主，称为西方民主的非民主化，用英文讲是 dedemocratization of democracy。此话从何谈起？民主，最简单的就是一人一票，至于你动不动脑



筋来投这一票，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当很多人认为他自己很理智地投这一票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的理智是否被正确地运用了。有这么一个三角形，媒体在一个角，政府、国会是一个角，民众是一个角。这三个角中关键的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但是，他们之间的了解怎么来的呢？就通过媒体这一个角的折射。媒体是基本的信息源，是影响社会思想的关键因素。此外，还有一个社会对自己本身了解的问题。媒体提供的信息是经过筛选的，是局部的，甚至可能完全是歪曲的。我要公平地讲，西方媒体刻意歪曲是少数，是极端的情况。在西藏问题上，我们看到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甚至造谣，看了令人非常生气。但是，一般来说，他们主要不是造谣、捏造，而是筛选、截取局部。比如我有一幅很漂亮的画，色彩缤纷，但他偏把你的视线专门引到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他撒谎了吗？没有。这里是黑的吗？是黑的。但他就不让你看到别的部位，不让你看到红的。这是西方媒体经常使用的手段。曾经，美国媒体为报道俄罗斯拍摄了一些东西回去，把俄罗斯拍得非常糟糕。美国一些比较有良知的人说，这种东西在美国也不少，只是没有给我们这么集中起来而已。如果西方媒体天天撒谎造谣，那它一点可信度也没有了。所以它有基本的基调，就是报忧不报喜，有轰动效应才有新闻价值。正如西方的一句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西方媒体正是通过这些方式影响了民众的立场和情绪。

既然西方媒体被认为是独立的，那么很多人就天真地想，既然是独立的，那么就是可信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种误解，民众形成了这种固定成见，于是你告诉我什么我就相信什么。要想当国会议员，或者要继续当选，就必须讲符合所谓主流意见的话，媒体在中间起到重要作用，并且又反过来加剧民众情绪。西方媒体又是谁在掌握呢？不是政府，而是由有影响的利益集团控制的。既然媒体是我的，当然要反映我的观点立场。掌握媒体的财团是少数人，因此这些少数人影响了整个公众对重大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我说的 *dedemocratization of democracy*，即民主的非民主化。因为民主不是大众的，只反映少数人的意见。

80年代的时候我有一次参加一个研讨会，就问《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你们一直宣扬你们是独立的，不会受任何干扰，那么你们为什么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一贯消极？我的理解是，如果一份报纸是真正独立的话，今天我可能看到说中国好的，明天可能看到说中国不怎么好的，后天可能会见到有说好的，有说坏的，这才说明你是独立的，因为你反映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但如果我看到你凡是跟中国有关的报道，总是消极的，我就知道你把积极的东西过滤掉了。西方政府不能



直接控制媒体，但在影响媒体上，他们还是很有本事的。比如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政府不让记者去报道，导致群众很有意见，于是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布什政府听取了民众的意见，允许记者去报道。怎么报道？把所有记者都放到航空母舰上进行跟踪报道。结果怎样呢？记者什么都看不到，什么也报道不了，所有信息来源都是国防部给的。所以他虽然让你去，还让你直接深入到部队，然而在部队里面，你所有的新闻来源仍然都是受控的。

你们看过一部电影吗，叫《古罗马的角斗士》（Gladiator），里面有一个情节，那个年轻的皇帝 Commodus，掐死他的父亲夺取了王位。他知道他没有战功，当不了被罗马民众真正尊重热爱的皇帝，于是迫切地想要拥有战功。当时有一位叫 Maximus 的人遭到他的迫害后成了奴隶，当了角斗士，打老虎、打狮子，他既有军事才干，又有打的本事。Commodus 想如果能把他打倒在地，民众就会承认，拥护他。但这几乎不可能，于是他就想了个办法，在和 Maximus 角斗前，在手里藏了把刀，趁开打前和 Maximus 拥抱的机会，在他肩膀上刺了一刀，这样就增加了他胜算的几率。这个情景深刻反映了西方世界从古罗马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种东西，即怎么样来操纵民众情绪。虽然 Commodus 最后也死了，但他确实是在迷惑群众。不管用什么手段，总之是要达到一种效果，即诱导舆论方向，让不明真相的群众永远蒙在鼓里。

回到我们的题目，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了解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相信下一代，就是你们这一代，会有更好的文化修养、语言方面的教育，可以更好地与外部世界交流。90 年代，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江主席的倡议下，成立了 21 世纪中俄和平友好发展委员会，中方俄方各选 35 位著名人士以个人身份参加。每年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开一次会，我认为这种交流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交往中间常有语言障碍。我国老一代干部和俄罗斯官员都能通过俄文对话；而我们年轻人在交流时只能讲英文。那个时候我觉得，如果我能讲俄语那有多好，就可以更好地沟通了。人与人之间要增强理解、交朋友，通过翻译总是比较难的。人类社会有多少婚姻是通过翻译结合的？我想很少。所以我说你们这一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应该有更好的机会。

造成不理解了历史的原因，还有宗教方面的原因。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往往会产生一些误会。中国的佛教、道教世俗化程度很高，因此我们很难理解像新教徒那样的宗教热情。不理解就会影响互信关系。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宗教工作，曾开过两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认为应该让宗教在稳定社会方面发挥应有的



作用。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样一些问题，西方国家的科学如此发达，为什么这些科学家还这么信上帝呢？有些人大惑不解。可是你问这些信教的科学家，他们会说，没有问题呀，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矛盾，一个是我的科学研究，一个是我的信仰；科学研究是我的工作，信仰是我怎么做人。但我们有些人仍然不能理解。你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特别是与国外交往时一定要非常注意宗教的问题。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对外交往时就对此非常注意。不仅是在政府的交往中，个人交往中也要很注意。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不尊重人家的宗教信仰。我在亚行主管中亚、南亚和高加索地区，包括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阿富汗、斯里兰卡等国家，其中很多是穆斯林国家。我有一次到孟加拉，刚好碰上斋月。根据伊斯兰教的规定，教徒在日出之前，具体到几点钟以前吃早饭，过了这个点就要不吃不喝，直到太阳下山后才能吃东西。在去孟加拉之前，我就跟亚行代表处的主任说，你告诉他们，现在是斋月，我尊重他们的习俗，白天出去参观，和他们一样不吃不喝。我很自信，因为我真的可以一天不吃不喝。可是，参观项目结束之后，负责接待我们的地方官员把我领到一个地方，里面已经摆好了吃的。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是我们部长专门嘱咐的，在这里给你们服务的人全是非穆斯林的，放心。而且还说，因为你尊重我们的习惯，跟我们一样坚持不吃不喝，所以我们也尊重你的习惯，专门请了人给你做饭。我非常感动。要想让对方成为你的朋友，不一定能成为现实，但你要让对方成为你的敌人，那是百分之百可以做到的。比如说你去一个地方，主人非常愿意带你去参观他们的教堂，那你总要尊重人家，不能在里面指手画脚，特别是穆斯林国家的清真寺，他们有很多规矩。这不是说我接受你的信仰，而是我尊重你的信仰。不光国家之间要这样，个人之间的交往也要很注意。

21 世纪，很多国家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美国原来的移民由西欧转向南欧、亚洲、南美。南美主要是天主教国家，而美国基本是新教。北非原来是殖民地，因此大量欧洲人移民到北非落户，特别是法国，这对当地的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世界上基督教人口大概有 18 亿，穆斯林大概有 13~14 亿，佛教人口大概有 10 亿。新的移民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当然由于宗教原因也会引起一些冲突。荷兰这个国家，对吸收穆斯林人口是非常宽容的。2004 年，梵高的一个亲戚——Theo Van Gogh，是一个电影制片人，也是一个思想比较极端的人——被一个穆斯林极端分子杀害了，这件事情对荷兰震动非常大，也给当地的穆斯林移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不处理好这些宗教关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谈全球化。其实在全球化的大框架下，有些非常普遍的东西人们不一定能看得清楚。为什么说模糊的国界呢？因为有很多传统的现象需要重新审视。美国有一个叫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的学者写了本书《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①，对美国的政治有很大影响。这本书是非常有争议的。有人评论说，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美国攻打伊拉克。书里提到几个概念，我们可以批判地去看，如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Indigenization）。亨廷顿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本土化的趋势是非常强的。作者是上个世纪20年代出生的，他非常赞赏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法国作家。这个法国人是1956年出生的，叫 Gillet Kepel，专门研究穆斯林社会，他提出一个观点，叫 La Revanche de Dieu，即“上帝的复仇”。为什么是上帝的复仇呢？他指出，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很多国家的宗教极端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的势力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越来越强烈，刚好形成与全球化对立的一面。有人认为，科学发展了，经济发达了，宗教的影响应该是越来越淡化。实际上非也，这就是所谓的“上帝的复仇”。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战后很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生急剧变化，使国家之间和社会内部各种关系的调整一时跟不上所导致的。再看欧洲，欧洲国家为了形成强大的市场，提高政治经济力量，就组成一个欧盟，并组成欧元区。参加欧盟或欧元区，成员国就要放弃自己一定的主权。比如，欧元区组成了欧洲中央银行，成员国要把自己的货币政策拱手交给这个央行，从而换取整个欧元地区，包括自己国家在内更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至少可以跟美国抗衡。这种放弃自己的国家主权（sovereignty），至少是部分主权的行，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中国加入WTO肯定要放弃自己原有的一些权利，但要明白，放弃了一定的主权可以换取更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所以还是合算的。况且，这种放弃是双方的，或是对所有参与者的要求，因此和“丧权辱国”绝对不是一回事。模糊的国界，其实就是主权的概念。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如中亚一些国家，有着非常强烈的民族情绪，把主权看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以前在沙俄统治的时代没有享受过主权，现在成为了独立的国家，当然非常珍惜。现在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搞输

^① 1993年，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随后，亨廷顿又出版了他的新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文明冲突论。该书一经面世，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而广泛的反响：从华盛顿到北京，从东亚地区到阿拉伯国家。



出“革命”，就是推行他的“民主”。可是美国越是输出，别人越要保护自己的民族性和主权，造成一方面全球化，一方面区域化、本土化的局面。这本书认为美国的文化应该是盎格鲁-抗罗宗的文化^①，其他的不能接受，因此备受争议，美国国内有些学者也不接受他的一些比较极端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从担忧美国前途、西方文明的出发点提出很多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比如他说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我认为他抓住了问题本质。不要以为发展中国家都现代化了就会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再比如他认为，在有些国家，经济进步使宗教大大地复活。还有，冷战后世界政治强调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了不同政治势力的矛盾的焦点。他提出最有争议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西方不应该仅仅担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应该担心伊斯兰本身。但这句话本身就非常有问题。因为很多有理智的政治家强调，要把伊斯兰和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我之所以说这些，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只看到全球化的一面，还要看到在这个大前提下，还有本土化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自己固有的文化得到了加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年了，开始时有人担心中国发展了，我们的文化就会丢了，都成了欧洲人。实际是这样吗？不是。因为经济发展了，科学技术进一步提升，生活水平提高，我们更有条件来弘扬自己的文化，不用担心因为学英语而把汉语丢掉。书法是我们最好的传统文化之一，现在都用电脑打字了，但仍旧有很多优秀的书法家，所以这个问题不用担心。

第三个问题，传统势力范围和新的地缘政治。最近大家注意到世界上的一些冲突，特别是俄罗斯。我也和国外朋友讨论这个问题。原来的传统势力范围是非常清楚的：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而现在没有明显的界线，新的地缘政治非常复杂。我们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非常成熟。然而最近跟俄罗斯发生冲突的格鲁吉亚总统、总理都很年轻，比我年轻一大截，所以政治上可能还不够成熟。他们非常信赖西方，认为西方是可靠的。然而发生冲突以后，美国军舰却走了。关于这件事的结果，西方说自己赢了，俄罗斯也说自己赢了。我说最好你们都不要打，世界还是和平稳定的好。北约有一个规定，如果你加入了北约，那么

^① 英文为“Anglo-Protestantism”。“Protestantism”即新教。基督教经过宗教改革运动后陆续派生出一些脱离罗马公教的新教派，统称“新教”，又称“抗罗宗”或“抗议宗”。因而“anglo-protestantism”亦有被译作“盎格鲁-新教主义”。



北约的每一个成员国都要负责你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谁打你我们一起动手。就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独立一事，我看到西方有些外交官评论说，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空前的团结，因为俄罗斯侵犯了格鲁吉亚。是这么回事吗？不是，而是因为他们内部利益的问题：北约东扩受阻了。本来他们可以把俄罗斯门口的小兄弟们都收到门下，这一下麻烦了，你一收上来就要保护它的领土完整，就要和俄罗斯闹矛盾。北约愿意跟俄罗斯去打吗？当然不愿意。前几年，俄罗斯输送到欧洲的天然气在乌克兰被卡了。因为俄罗斯提出卖给乌克兰的天然气要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而乌克兰不同意，想继续得到俄罗斯的补贴，心想你既然不肯给我补贴，我就把你输到德国的天然气半路给截了。因此，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认为，俄罗斯作为一个能源输出国家不可靠。从中我们就看到了新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我到中亚的国家去访问，在跟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这些国家从独立到现在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就是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这是他们历史原因造成的，但这种情结和思想对于这些国家融入新的全球经济环境有一定的影响。中国没有这个包袱，我们可以做到很多事。最近，韩国政府部门提出来要恢复学习汉字，此举居然引起了很大争议。我就跟他们说，中国年轻人都在学英文，中国每年大概在学英文上要花掉 5000 万美金，但我们很少需要担心学了英文会把中文丢了。这就是我们国家的优势所在，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民族身份非常明确。

最后，再讲讲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我不跟大家讲过程，大家都很清楚，在网上都能查到相关的报道。我只想提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对发生这件事后的各种各样评论，我们该怎么看？我想首先，不要匆忙下结论。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结论了，比如有人发表这样的观点：美国这次金融危机预示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确实有点耸人听闻，难道明天美国就是社会主义了？有人说，美国采取的这些救市手段是美国式的社会主义，看起来挺像社会主义的一套。还有人说，这一次危机和 30 年代的大萧条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它更加严重。翻翻历史我们就知道，大萧条从 1929 年开始，绵绵不断到 10 年后经济才恢复。而现在危机才开始，怎么能说跟它没有差别呢？就算没有差别现在也不能说，10 年后再说。还有的观点是，美国金融体制存在极大的问题，没有监管。我可以告诉大家，美国金融监管比我们要严得多，只是在某几个点上没监管住，就像大堤有几个窟



窿，导致大堤被冲垮了，所以现在美国监管部门的任务是去堵那几个缺口。因此，还不能下结论说美国的金融体制不灵了。

说起 1929 年的大萧条，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由于当时美国总统胡佛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美国的个人主义，即个人利益不可侵犯。所以他认为政府不能去干预市场，即使在出问题的情况下，也不应该采取措施来干预市场，因为这会影响每个个人的权利。第二，他不顾很多人的反对，实施了一个税法：为保护美国的经济，把一些进口税提高到 50%。这样一来，欧洲国家纷纷采取报复措施，导致形势的恶化。后来凯恩斯主义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而产生的。胡佛总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有一次当时的财政部长梅隆和胡佛总统谈了一个半小时后，说了一句话：我跟胡佛总统谈话，就好像坐在一个墨水缸里洗了个澡，黑压压的一片。如果你把一朵鲜艳的玫瑰花放到胡佛总统手里，一会就枯萎了。然而到了 1987 年的股市大跌，美联储迅速做出反应，为商业银行提供充足的资金，要求银行提供贷款，提供流动性，所以危机很快就过去了。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刚爆发时，美国隔岸观火，想让亚洲自己来处理这件事。但后来，亚洲金融危机一直影响到俄罗斯、巴西，国际金融机构才采取一些措施。当时有人说，亚洲将十年见不到阳光。我到亚洲开发银行讲话时说，我不相信。亚洲的基础设施已经建起来了，人力资源也得到了发展，这些成就是金融危机打不掉的。所以亚洲虽然现在遭受重创，但很快就会得到恢复。结果不出所料。根据这些以往的经验，我不相信美国将会萧条 10 年的预言。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世界银行出了一本书，叫《亚洲奇迹》(Asian Miracle)，说在亚洲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亚洲有些人认为这种奇迹归因于亚洲的价值观，包括亚洲的体制。那时，亚洲非常自信，认为有关亚洲的一切都是好的。然而金融危机一发生，亚洲的一切都不灵了，所有的事又变成了坏的，这就走得有些极端了。我认为美国的经济有极大的反弹性和自我修复能力。1929 年大萧条以后，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加强了干预，推行了一部分社会福利，后来又慢慢回到让市场经济发挥作用。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政府干预的力度很大，等到危机过去之后，经济复苏，美国又回到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状态，因为美国根本的信条个人主义是不会变的。比如枪支管理，我们很不解有人拿着机关枪在校园里扫，为什么还不把枪管起来？最近，全美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执行主席 Charlton Heston 死了，他是坚决捍卫美国人持枪权利的